

第四章

批判理論

法蘭克福學派与哈柏瑪斯

馬克思主義學家長久以來的期盼，就是能產生無產階級意識，进而推翻压迫的資本社會。1920年代，一群西方學者开始对这样可能开始感到绝望；事实上，1917年在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最初马克思主义者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感到怀疑，许多社会学者认为回归到计划阶段，是为了去发掘为何即使不公平与疏離持续，革命仍会延迟的原因，以及需要作什么才能改变情勢，以求迎接改变成新社会主义政体。这是此篇文章所探讨的核心重点。

即使前社会主义政体在二十世纪有不太渴求的真相或公平狀況，部分社会主义學者仍对社会主义终将转化保持樂觀，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初许多西方社会學者则认为，资本主义似乎是贏了，而且也不认为有必要去追寻旧的、对于平等与计划已是名声败坏的十九世纪梦想；然而在非洲、中亚或是俄国本身，以及被资本主义政体所抛弃的许多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胜利并非兴高采烈。有鉴于此，有必要以批派理論解释，为何二十世纪无产阶级勞工转化至世界会失败，同时反映在二十一世纪仍能辨識革命阶级的可能性。

社会研究学会

法蘭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学会成立于1921年，那时在欧洲与德国是个混亂与动荡的时期，即使如此，革命并未如许多马克思學者所预期般地发生，真正发生的是保守主义升高，在德国达到最高点形成国家社会主义政体。

学会之所以能够成立是來自一位移居阿根廷的富有德国人Hermann Weil的捐赠，Weil将他所赚得的财富送回欧洲，他的儿子Felix Weil就讀于法蘭克福大学并取得政治学博士。Felix Weil在法蘭克福逐渐和好几个激进团体有关，并产生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反犹主义而成立独立研究机构的想法。Felix說服父亲捐赠学会，而他自己也投身于此，一直到二次大战开始他回到阿根廷照料家族事业为止。

1930年代反犹主义在德国因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份子的推波助澜下更加明显。学会主要的研究要务为分析反犹主义，以及探讨达到解放、公平社会的社会文化条件。学会很幸运地享有财务独立，当时在三0年代，学会的犹太成员被强迫放逐。1934年这个学会与由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主导的哥倫比亚大学有关，因此这个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会安顿在资本主义的中心—紐约。

很多学者与学会有关，除了霍克海默，还有亞当諾（Theodor Adorno）、盧卡契（Herbert Marcus）、路文陶（Leo Lowenthal）、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Karl Witrioge、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与佛洛姆（Erick Fromm）。这些学者产出大量的著作，而且包含相当多有洞見的，例如路文陶对文学有兴趣，亞当諾则是倾心音樂，波洛克研究资本主义与国家间的交口，佛洛姆综合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分析主义。即使每

位学者都和学会批判马克思主义观点有关，但是他们并没有持有单一理論立场，或是必须赞同革命实践的共通看法，由此可知，把这些批判理論学者视为法蘭克福学派在某种程度上是会误导，因为并不属于单一重点团体。

霍克海默在1930年成为学会主任，在他任内，他强调学会要成为哲学家、社会主义学者、经济学家、歷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必须持续地成为工作伙伴关系，以最精致的方法去追寻伟大的哲学问题。学会的主要研究集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異化与宰制，学会研究是超越学科而不是在各学科间的，也就是说，研究与理論态度是优于个别学科的位置，以建立一个超越学科的社会理論。

之所以能說服、建构为超越学科的研究本质，是因马克思主义是开放、歷史、辨证的理論，它需要精确的发展、修正与调整，因为它是当代社会歷史现实，不断发展与改变。学会研究者看到他们任务的急迫性，因为即使一再发生资本主义危机，但是受困于法西斯主义涌现与缺乏劳动阶级革命的热情。

马克思主义理論与实践的重新考量，特别集中在劳动阶级的革命意識問題。霍克海默、亚当諾与马库色在三0年代推論，应再表述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劳动阶级的焦点，因为虚假意識箝制阶级，穿透最深层的人類性格，在这样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不可能立即产生阶级或个人的解放行为。这样对于劳动阶级革命的悲观可能一直持续，尤其在二次大战开战后。

1933年当纳粹得权后，霍克海默和其它犹太成员自法蘭克福大学驱逐，学会所集合的优秀智力因而分散。大部分学会的学者具有犹太背景，因而被视为是相似的。不論他们的信仰有多相似，他们都突然領悟到国家社会主义崛起的意图，而且大部分学会成员都聪明的选择流亡，他们前往瑞士、法国、英国与美国。

霍克海默去紐约加入波洛克和亚当諾。很幸运地，在流亡年间以及学会在紐約最初成立时，Weil家族的私人捐赠仍维持学会处于相当的财务无虑。基本上，霍克海默、波洛克和亚当諾在流放期间代表学会，在1940年代三位在洛杉矶直至1950年返回法蘭克福。其它学会流亡者则另谋多种职位，例如马库色服务于策略服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与国务院，之后在1954年前往布蘭戴斯（Brandeis），1965年前往位于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

在这个章节中，我们专注于霍克海默、亚当諾、马库色与佛洛姆的著作，他们主张的大纲为当代批派理論者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验证基础，其将出现在后面的文章。

法蘭克福学派的批判学者

我们把自己界定在寻找人類的为什么，不去进入真实的人類状态，反而是去插入新類型的野蛮。

霍克海默 (1895-1973) 霍克海默的父亲在斯图加特 (Stuttgart) 是个制造业者，霍克海默在服兵役前曾接受商业训练，有一部分的训练是与他的朋友波洛克在1913年—1914年前往伦敦和布鲁塞尔学习法文和英文。1918年之后他就就读慕尼黑、弗莱堡 (Freiburg) 与法兰克福的大学，后来于1922年在法兰克福取得博士学位，论文有关康德。他在1925年成为社会研究学会的讲师，1929年被指派为学会社会哲学的新任主席，1930年成为学会主任。

亚当諾 (1903-1969) 亚当諾出生于法兰克福，他的父亲是个成功的犹太商人，而母亲在婚前曾拥有出色的歌唱事业，亚当諾是她娘家的名字。她是德国歌手与法国军官的女儿，她的父亲拥有科西嘉与热亚那的背景。很显然地，回应波洛克的忧虑，学会名单中有太多犹太名字，亚当諾在美国时拿掉名字中的Wiesengrund。

由于跟他们家同住的阿姨是曾开过音乐会的钢琴家，早期亚当諾的家人鼓励他学习钢琴和作曲，这样对音乐的喜好在他从事文化产业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时仍一直持续。亚当諾进入法兰克福大学，以胡塞尔 (Husserl) 的现象学论文于1924年取得博士学位，1925年他前往维也纳向贝尔格 (Alban Berg) 学习作曲，也是那个时候开始欣赏勋伯格 (Schonberg) 的无音调实验。1928年返回法兰克福，1931年开始与学会有关系，1938年成为全职成员。

马库色 (1898-1979) 马库色出生于柏林，来自富足、被同化的犹太家庭。1918年在他服完兵役后开始与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与革命军议会往来，1919年以离开社会民主党作为看到党背叛无产阶级的抗议。

马库色在柏林与弗莱堡的大学攻读哲学，1923年获得文学博士，之后六年在柏林是个书商、从事出版业，1929年回到弗莱堡跟胡塞尔与海德格 (Heidegger) 研习哲学，1932年离开弗莱堡，绝大部分的因素是与海德格的政治分歧，海德格的右翼观点与马库色的马克思主义冲突，不过在胡塞尔的推荐下，马库色于1933年成为学会的一员。

佛洛姆 (1900-1980) 佛洛姆生于法兰克福，成长于宗教气氛浓厚的环境，他的犹太双亲都是出自犹太司长 (rabbi) 家庭。在他二十岁出头时与后来也是学会一员的路文陶，活跃于由犹太司长组成属于法兰克福最大犹太教会中的宗教团体。佛洛姆在1926年于慕尼黑研究后减少东正教比重，但他从未弃绝他的宗教。

师承韦伯 (Alfred Weber)，佛洛姆在海德堡以犹太法律：海外犹太人社会学的贡献获取博士学位；佛洛姆在海德堡也认识了Freida Reichmann犹太心理分析学者，后来成为他的夫人。他继续在柏林精神分析学会受训，之后于1927年自行开业。1929年法兰克福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佛洛姆与其夫人都成为新学会的讲师，1930年他成为社会研究学会中社会心理学部门的主任，他对结合马克思与心理分析的兴趣引起霍克海默的注意，不过佛洛姆与学会的关系在1940年以前就结束了，主要原因是霍

克海默不同意佛洛姆对佛洛伊德的批评。

法蘭克福学派的中心理論与方法

多位学会成员的理論背景大不相同，但大部分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海格尔（经盧卡契 Georg Lukacs过滤）、马克思、韦伯与尼采。批判立論涉及描述与分析现代社会和与过去相关的理論发展，为此使他们很沉重的了解到造成压迫的力量；此外，分析也显示压迫如何被新的、解放的概念化与实践所推翻。

批判理論学者关心在现代社会启蒙合理性的承諾如何被推翻。根据霍克海默，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作为倫理、道德、宗教代理人的理由清偿。如韦伯指出，理由已经合理化，走向官僚、控制的情势，而不是自由平等的社会。

理由与客观 霍克海默区别主客观理由。客观理由是指为决定社会目标的手段，客观理由是一个力量，不只存在个人心理也在客观世界，是人類、社会阶级、社会组织、大自然间的关系，并得以显现。

主观理由 只是单纯地关乎于手段和目标，为目的偕以适当程序，多少视为理所当然，并大概地自我解释。主观理由是手段的理由，它对是否目的是有理由的附加一点重要性，或者只是公平的。当主观理由在作道德选择时建立在不「正当」的基准时，显然典范的接受性、我们行为与信念的标准、道德与政治的領導原则，所有我们最终决定都是取决于事实而非理由。

把焦点放在主观的或手段的理由是作为实证哲学的证据，表示理由可以很容易的被纳粹验证利用，组织忧虑用于消弭贫穷与苦难。主观与手段性理由涉及到把科学的事实分類与可能性估算升级，是唯一「权威」。在主观理由方面，正义与自由优于不公平及压迫这样的論述是在科学尚未能证实的，而且也没有价值的，这就好比是「红色比藍色漂亮」的陈述一样。

批判理論学者主张，不可能不去关心客观研究，因为事实与价值密不可分，而且研究者总是属于该受调查的社会情境中的一部分。更精确的說，正面方法基本上被拒，在实证理論的數学独有信条，是心理分析的技术官僚。霍克海默与亚当諾坚称实证理論所看到的世界只是「事实与事情」，未能将事实与社群与个人的需求与渴望加以連結。

另一方面，批判理論也不是只理解歷史发展的多重事实，但也从歷史与相关现象看到了事实本身的意图。依量化方法所确认过所谓的事实，也被实证主义者倾向视为是唯一的科学，通常只是表面现象，其昏暗不清，并没有揭示根本现实。批判理論者的要务就是去揭露真实情况本质的「事实」，为此，为非传统与解放的现实提供蓝图。

对批判理論学者而言，社会状况的分析是一项道德事业。霍克海默认为康德道德一

般概念的义务与责任是抽象概念，没有满足处于改变社会中人類的需要。人類的本质是会不断地被各种事情影响与改变，而且没有一个惯例是永远可以对个人、社会与自然间的关系加以界定。应该只有一个道德典范—幸福，因为人類无法从追求幸福与惧怕死亡中脱逃。

霍克海默相信要从有可能的启蒙客观理由转化到现代的主观，手段性理由不会是意外，也不能再任意实践、肆意地保留。海格尔指出理由根据歷史而改变，但并不保证先进辩证是通往自由；如同马库色指出，反驳是辨证法的中心范畴。反驳可以表示从不合理变成合理，例如决定事实，在此不自由是自由的条件，而战争是和平的保证。

在现实社会，理由是忍受不公平、勞苦与苦难的手段；同时运用理由就是未來的最佳希望。例如马克思主义以理由之名，型塑成如黑格尔哲学的評論，在现代社会理由只能透过不断的批评，然后个人才能了解社群生活的矛盾，并寻求方法以超越它。

解放理論 如同马克思，批判理論学者强调理論性的批评不只是要「事实」的合理方法，同时也帮助个人了解这「是」什么，为此去看这「可能」是什么。在方法論上，批判理論克服在理論与实践间、理想与现实间的断裂，藉此可以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反駁聯盟，要从剥削中获取自由，从贫乏获取财富，从限制消费提升生产；所以說资本主义的非常辨证架构是：经济过程的每种型式与组织引发反駁，而危机就是以反駁所表现的极端形式。如果启蒙与进步代表，从邪恶力量的迷信思想、妖魔鬼怪、盲目害怕中解放人類，简而言之就是从恐惧中解放，然后谴责目前所谓的理由是所能给予最大服务的理由。负面批评从不实极点的残骸拯救有关的真相，然后引导到对反駁的理解，因为藉由陈述其相关性拒绝主流意識形态的绝对主张，以及现实的仓卒主张。

理論性批判对革命性的改变看來好似需要，其实是并不充分的条件。就如同马库色說明，即使理論仍是最主要的，但是实践跟随事实，而非反其道而行，改变需要催化动力。不过对学会学者而言，在资本主义壟斷的情况下寻找催化动力是个问题。马克思所想象以资本主义去满足大量需求的无产阶级異化似乎被推翻了，结果增加劳动阶级与以批判之名行事人间的意識差距。革命劳动阶级意識的缺乏、独霸资本主义以及独裁政体的巩固，都在不远未來产生对于解放转化可能的悲观看法。

不过批判理論学者指出，即使资本主义可能满足许多无产阶级的需要，但是增加消费并不必然转化成人類满足，而且绝对无法抵消无产阶级的劳动異化。资本主义，特别是独占资本主义是根据营利而非人類需要來调整消费，它愚弄消费者去相信他们的选择是能满足所需。

不論消费者偏好哪一个品牌，即使得到他所选择的，并不代表他所付出钱就值

得，兩個等价热门商品的质量区别就好比是兩個品牌香烟的尼古丁含量的差異，实在非常有限。

即使消费者对选择产生怀疑也不过是个假象，因为具体化的普遍性，所以并无法保证革命意識的产生。具体化（Reification）意指宰制（domination）的过程，其藉勞力呈现在外部事情的表象而且可由人來控制。举例來說，经济波动常被归罪于「市场」运作，但是市场并非抽象、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是由人对金钱、商品与贸易所作出的决定。

韦伯（Max Weber）的好友盧卡契稍早前曾开发、阐述具体化理論。他在《歷史与阶级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1923）建议，无产阶级受困于资本家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去相信资本主义和異化的勞力是「自然的」，也就是抽象市场动力是无法避免，个人也不能控制。因此盧卡契认为，战胜具体化是先锋知識份子的要务，藉由教育无产阶级，助其了解在生产关系的「真正」定位，并表明无产阶级是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

对批判理論学者而言，具体化是客观过程也是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一部分，而主观是内含在信念和了解中。具体化是不真实的意識，是自我打击的異化，異化是个人和社会阶级自受的。因此批判理論的义务是要在无产阶级中，协助产生革命的意識与实践。

佛洛姆与佛洛伊德 简单的经济决定論不是革命转化的动力，深藏在意識中的文化或意識形态同时也在产生扭曲性格，扮演重要角色，这样的个性产生优势状态。这个层面的理解对佛洛伊德的研究批判理論很有帮助，因为它为不实意識提供解释，同时也解释现代社会的权威个性類型。佛洛伊德的性欲理論也坚持，完全宰制会被推翻，基本上人類对自由的渴望。

佛洛姆把佛洛伊德的研究纳入其批判理論的中心，主张心理分析理論和马克思主义歷史唯物論并立，因为它揭露受行为控制的无意識性动力，非理性行为在社群生活—宗教、风俗、政治与教育都有其缘由。

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隐藏在人背后、使其行动与指引的是经济动力和政治扮演；心理分析研究指出如此过于狭隘。社会是由人所组成，而人拥有狂热争取的潜能，这种人類潜能是被每个社会的经济总体与社会力特色所型塑而成。这些动力产生了特定的社会无意識，并在压抑因素与所给予的人類需求间造成冲突，而兩者都是人類功能的关键（例如特定程度的自由、鼓舞，生活樂趣、幸福等），发生革命并非只是新产生的动力，也是人類本质的部分压抑，只有在兩者结合才会成功。

心理分析的焦点在于家庭，其对批判理論相当重要，因为透过家庭，社会压制个人个性，特别是透过家庭，社会重建阶级架构；此外，家庭也会产生支持反犹主义的

独裁性格，。

为研究何种经济与政治结构影响个人的精神生活，因此促成权威与家庭研究的学会计划，1930年代由德国主持，1940年代由美国主导。由亚当諾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的辩证（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1944）》为独裁性格的发展与法西斯主义社会的源头探索社会与歷史基础。

社会本质、人類和改变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批派理論学者主要把焦点放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的歷史发展。主要转化是个人竞争资本主义的替代，与独断及国家资本主义（请見第五章）。国家资本主义在二次大战后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評論就不再只是单纯的政治经济批评。

这不再是属于自由市场、自由政体的资本阶级公共范畴，其迎合批评者去实行法治。解放的规范在公共与组织化的架构也不再迫切；相反地，必须从文化、艺术与哲学的未达理想而去追寻，或是在人類主观的深层架构下推翻压制。

大众文化与社会支配的延伸将资本主义体制转化为心理分析，以及人類的经济经验，这代表韦伯所討論手段合理的胜利。手段合理（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是在现代社会的压制机制，使人性丧失作为与合理性或理由紧密结合，关切人類价值与正义。

霍克海默甚至在战胜法西斯主义后谈到：

希望人類可以更为满足，过去是群体时代而今天首度由人道主义者界定。技术性知識平行拓展到人類的想法与活动，他有个体的自主权，他有能力抵抗大众操控的成长组织，他的想象力与独立判断似乎减少。为达到启蒙而产生的先进技术工具同时也伴随去除人性化过程。

韦伯对于官僚化、没有人情味的「冰冷黑暗」世界的恐惧，对批判理論学者而言似乎是可以理解，这将使要以何种方式去解放改变都变得困难。

讽刺的是，马克思与韦伯都了解，当科技与科学逐渐成为人類所需的单一决定要素，促使人類控制自然世界的技术性「进步」会变成「进步的奴役」。

现代人類的消退本质不能自社会进展中分开。一方面，经济生产力的成长供养世界获得更好的正义；另一方面，它也容许操作比例不均的技术组织与社会团体优于其它人。即使如此，个人会在组织提供其所应得之前消失，组织供给他过去所没有的。

批派理論者早期同意马克思的想法，科技对人類需求的满足是可控制，是樂觀而非悲观的方法，但是后来因大屠殺而放弃这样的樂觀。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烈士，经过烈狱般的苦难，在堕落中反抗征服和压迫，没有流行文化的夸张个性与传统式的显要。集中营的无名烈士是为争取人道而生存的表征，哲学要务是将他们的所作所为翻译成语言好能被听见，即使微弱的声音被暴政消音也必须为之。

纳粹技术专业与「现代」人類所产生整个人道部分的拔除有关。似乎在现代社会，意識与个人责任「客观地」降低绝对官僚化的情况…在此组织功能决定且优于个人的自主权。现代人類所消退的本质不能自社会进步分离，而且即使个人会在组织提供其所应得之前消失，组织供给他过去所没有的。在不义的生活状态，大众的无能与顺从增加，并也允许他们增加商品量。

霍克海默指出，「个人」的现代庆祝是很讽刺的。启蒙在机器为人类工作的梦想已经实现，但同时人们的行为也越来越像机器。社会文化和商品激增满足虚假的需要，也延伸了资本主义的宰制。举例来说，「真正的你」是由你所穿的衣服、所开的车子，甚至用的牙膏所界定。佛洛姆指出，我们喝的是商标。拿着可口可乐的瓶子，我们喝的是广告上帅哥美女的照片，我们喝的是广告标语(the pause that refreshes)...至少我们有用味觉饮用。个人在奴役消费者与大众文化观众的「单一尺寸社会」会被科技推翻。佛洛伊德认为主观对批判理论很重要，因为个人的自主权在消退，以社会上的批判反应可能也能引导到解放的实践。

人類本质 人不能自社会分离，因为个人只是所属全部的一部分。他的关键决定、特色与倾向、兴趣与对世界的看法都源自最初的社会以及所处的社会命运。孤立的个人只是假象：最受人尊敬的个人特质，例如独立、争自由、同情心与正义感，都是社会及个人的美德。因此，个人的解放并不只是从社会解放出来，还有社会自雾化走出…如此可能达到文明时期与大众文化的巅峰。当社会改变，人的个性也会跟着变，今天年轻男女的理解，根本上就与本世纪初的有很大的差异，这表示必须扬弃人的本质是无法改变的想法。人类的需要，「包括在性方面」拥有「历史性的性格」。

亚当斯与霍克海默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Odysseus)从特洛伊(Troy)到伊萨基(Ithaca)的旅程，说明人类对大自然的控制，以追查现代精神压迫。两位指出对大自然的控制对人之所以能成为人是必要的，同时也标示了人类自我压迫的开始。在奥德修斯旅程的重要事件是他从赛伦(Siren)逃出。当他听到赛伦的歌声时，他必须从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间通过。不管来自哪裡，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有权抓补。因为没有人能抗拒赛伦歌声，抓捕赏报可说是势在必得。赛伦代表感官、自然世界，也是佛洛伊德的世界。奥德修斯很巧妙地找到抗拒赛伦诱惑的方法，他把蠟放到船夫耳裡，所以他们不会听到歌声，而他自己则是绑在桅杆上，所以即使他自己可以听到歌声但不会屈服、受到诱惑。奥德修斯相反地找到脱逃的条款，得以巧妙脱逃的加以完成，所以他对赛伦有主观需要但并不去服从他。

奥德修斯能够战胜自然，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压迫自身本能内在的天性，因此，他成

为资本家的模范，资本家愉快的决定对理性资本主义的成功是关键。奥德休斯的策略也为强化相较于其它人的优势，其它人听不到歌声而只能依赖奥德休斯的判断。船夫结合在同一个节奏下，就好像在工厂的现代劳工一样；而且他们的无能也像现代劳工，不只是单纯作为执政者的策略，而是终于改变个人社会邏輯推論。就长远來看，自然的驯化导致「资产阶级的商品经济」，且为「新野蛮」建立条件。

本能天性的压迫很必然地为个人和社会进步产生变革，这就是佛洛伊德所称的唯樂原则（pleasure principle）到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

唯樂原则	现实原则
即刻满足	延缓满足
快樂	限制快樂
喜悦（玩樂）	勞苦（工作）
接受力	多产
没有压制	安全

转变的结果是从不可抵挡进步的诅咒变成不可抵挡的退化。

亚当諾与霍克海默在1940年代后对任何集体解放计划更加悲观；不过，盧卡契建议本能压抑与优异充分的技术理性结合可以是解放运动的來源，也就是说，太多的压抑一定有最终的反抗，对抗那些压制的力量。

社会改变 卢卡契建议佛洛伊德的性压抑并不是单一、静止的现象，它是多元，有关社会改变。在现代社会，压抑是意味深长的。产生过度压抑（Surplus repression）肇因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富足能让人从社会中解放，越接近自经由不足与未成熟合理化所约束中解放个人的真实可能，对维持与合理化约束以免于优势瓦解的需求就越强烈。过度压抑对优势控制的兴趣更胜过对人類文明发展的关心。

可以透过关于勞力时间与經歷大量生产导致人類存在的质量改变，以及扩大自由范围成为真实活动的事实，以破坏过度压抑。时间在理性与非理性权威间、以及介乎压抑与过度压抑的区别是能由个人來界定与证实。假使人们无法现在加以区分兩者，并不表示给他们机会但仍无法学会。

透过大拒绝（great refusal）可以完成自「铁籠」中脱逃，这裡的拒绝是指「接受」消费社会。马库色相信这样的拒绝不是出自勞工阶级治，因为他们被先进的资本主义所吸收，去满足消费需求并产生酷似「美好生活」。大拒绝出自下层被逐者与外部人、被其它种族所剥削残害者、失业与无法工作者，他们存于民主社会之外，而他们的态度是革命的，即使本身并无意識。当这些人开始「拒绝玩这场游戏」，「终结的开始」就能看見了。

马库色希望1960年代多种跨文化活动表示大拒绝的开始。对他而言，爱与性的自由

是通往社会转变的道路。当个人开始认知到社会过于合理化，孩童多型态性欲产生逆转，那是现代、后戀母情结（post-Oedipal）生殖性欲的压抑。身体将只是「快樂的工具」，如此加速单性与家长制家庭的瓦解。作为社会转变的动力，马库色对性革命樂觀的预测早在包括爱滋等性传染病严重问题发生前，就已认知到了。

亞当諾、霍克海默甚至马库色都了解，转化是客观必要，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論中，这个需要在界定转化动力的社会阶层间并不明确地呈现。但是，不論是以大拒绝或其它型式，反抗仍是极为重要，因为新旧法西斯主义非常不同。新法西斯主义以压制立法及大众的支持破坏民主，如此使既有文明与政治民主后退。今天部分学者主张这些确实发生在二十世纪末的西方社会，而且非常重要的社会学问题仍然存在，谁又能抵抗之？如果不是勞工阶级，也许反抗会來自兩性平权主义者或少數民族。

阶级、性别与种族

阶级 批判理論者体认到现在社会的阶级区分，但是并没有提供阶级的系统分析，他们更关心心理与经济压迫会以何种方式推翻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庭是心理压迫的主要制度。佛洛姆指出家庭是通往社会或社会阶级的媒介，它对孩童甚至成人订出明确架构。家庭是社会的心理中介代理。

学会于1930年代进行权威与家庭研究，探讨家庭本质在工业资本主义下所产生的精神压制。批判理論者指出，家庭并不是自然、不会变化的型态，而会因应外在社会与歷史条件改变。家长制、中产阶级家庭是特别为个人资本主义的需要所发展而成，它是理想的家庭型态，倾于普遍并确立主观的优势。

权威与家庭研究以德国勞工态度与信念的经验主义为基础。发给勞工三千份问卷，询问他们对孩童教育、工业合理化、避免新战争，以及政体真正权力的看法。

在这个研究中采用了一项重要的创新方法，答案是逐字紀錄，然后分析心理分析学者所听到病人的关系，关键词是指称那些答案内容的潜在精神分析现实。这项研究揭露信念与性格间的不一致，研究发现大约有10%的答复者出现独裁主义者性格，大约15%有独裁主义的观点，大多都是有矛盾情绪。

霍克海默与亞当諾在资本主义政体下，家族制与中产阶级家庭是独裁主义性格的基础。戀母情结冲突涉及到母亲的拒绝并支持父亲权威，这对儿童的意义是去接受社会权威。孩童将对父亲权威的「理性」适应内在化，以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識与超我，或者是善惡观念，去调适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

个人的自我控制、对工作与纪律的处理，以及建立家庭、特定理念、实际生活的协调性、理由选择、在建设性活动中产生坚持与快樂，这些都是可以去发展的能力，在这个情况下，只有在受过自我教育的父亲指导下，能在学校生活中胜出。

很明显地，这裡的孩童指的是个男孩。在早期资本家、中产阶级社会，父亲权威提供儿子目标去加以反抗，这样的反抗产生个人自主权以及拒绝宰制的能力。然而随着自由主义转化，从企业家资本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父亲的经济权力与家庭权威式微。孩童仍有戀母情结的复杂，但了解到父亲并没有赋予完全权力与权威，然后去寻求父亲的替代以建立更强的自主。不过，单就父亲替代是工具性理由的抽象权威，随着结果，孩童变成大众个体、受外界宰制的社群原子，他们是自戀、唯物主义、残酷成性，而且无法抵抗宰制。孩童了解不是父亲，而是玩伴、邻居，合伙同伴，运动、银幕上的領袖，是适当心理与生理行为的权威。我是张吉米
<jimmy168@ms13.hinet.net>

独裁者、法西斯主义領導者的协定基础，是建立在转化家庭关系的精神附带条件。从他们研究德国工人的家庭生活，批判理論学者推論，德国勞工阶级对右翼政权的反抗，远不及激进意识形态所建议的，而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般热情也支持这样的結論。

性别 霍克海默与亚当諾把焦点放在处于国家资本主义家庭的男孩问题。母亲，也是自然的代表，在早期中产阶级资本主义阶段，其对男孩是安全与舒服的來源。女人一般而言是不可抗拒且无权力的难以理解形象。母亲提供躲避父亲权威的慰藉，而她无条件的爱也是情感支撑的來源，以另一种眼光、幻想的现实提供给孩子，这是本能爱神的眼光。相反的，对于理性权威，快樂信条与现实信条相反。

根据批判理論学者，当女人进入生产范畴，以及她们许多的社会化要务都被组织接管，此时田园式的情境就会改变。母亲停止提供躲避父亲权威的慰藉，因为她变得越來越像男人。对于亚当諾、霍克海默与马库色，这是负面的一步。举例來說，马库色认为对女性很自然，且建立在承諾喜樂、和平、终结暴力的女性信条，同要是男人与女人的解放基础。

颂扬女性信条在批判理論学者的研究中是个盲点。这个信条仅重伸性别二分法支持资本主义父权制，母亲可能代表对儿子的解放承諾，但此承諾并没有扩及到女儿身上。佛洛伊德說明，女儿必须拒绝母亲优于父亲以建立成熟的女子气质；同时，如同她们的母亲，必须向男人体现相同解放的承諾。

这裡有一些批判理論者对十九世纪中产阶级家庭的怀旧之情。他们看到家庭型态的毁坏，爱的范畴遭破坏以及对大众社会的手段反抗可能。但是男性所提供的感情支持混淆对家庭型态、母亲与女儿的伤害。亚当諾和霍克海默推断，缺乏父亲造就大众个人或是独裁主义的个性，但是缺乏母亲的社会则表示丧失未來生活在自由可能，是个没有爱与希望的社会。一般而言，缺乏母亲的社会在反犹主义与种族主义打下印记。

种族 霍克海默和亚当諾爭論种族不是自然特别的特色，而是在特殊社会背景下有影响力的符号。例如反犹主义者，投射压抑的害怕与冀求超越鄙视者，特别是那些对

压倒性社会与经济力量惧怕的无能領導者。他们认为納粹主义是精神分析的问题，但是精神分析因素本身也必须了解被经济政治因素所型塑。

在资本主义社会，反犹主义对中产阶级是有经济上的重要，因为它隐藏在生产关系中宰制的本质。亚当諾和霍克海默指出犹太人在歷史角度上被拒绝进入制造业，所以经常在商业与金融业寻求生计，因此，商业不是他们的才能而是命运。在这些职业的生产力真正本质常隐而不彰，商人和银行家似乎自生产力的勞工而受益；然而，他们其实只是单传的中间人，隐藏于资本主义大量制造所分配剩余财富的事实。犹太人变成整个系统的地方长官并被其它人仇恨。在壟断资本主义下，财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与中间人的角色变得多余；但是，犹太人在壟断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经济问题上仍然是好用的代罪羔羊。

犹太人和其它被污名化者很容易成为迫害的目标，他们被用作资本主义的社会分配不当的补偿与无意識的反社会权力，而其几乎没有受手段性宰制系统的压制。

1940年代，一项野心勃勃处理偏見与特别是反犹主义的研究在美国进行。偏見研究是一套五册的合作著作，包括亚当諾、柏克莱公共意見研究团体 (Berkeley Public Opinion Study Group) 成员，R. Nevitt Sanford、Daniel Levison、Elsie Frankel-Brunswik 等主要研究员，霍克海默是计划的总统筹者。探讨偏見的主观表现，其主要理論基础为心理分析学。

这项研究运用质的工具，例如访谈，以及量的工具。五册研究为战后检视退伍军人个性特点与偏見态度的动态偏見 (*Dynamic of Prejudice*)、反犹主义与情绪失控 (*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包含对反犹病人的心理療法案例研究、探讨大众說服工具的骗局预言 (*Prophets of Deceit*)、描述德国反犹主义歷史根源的破坏预演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以及威权主义的性格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是检视偏見与人格特质的关系。

威权主义的性格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特别关注描绘法西斯主义者可能的人格特质。执行大规模的问卷与访谈，建立F等级以衡量反犹主义与反民主的态度。这项研究推断具偏見的个人有因社会化所导致的明显个性。偏見与反民主的个性來自权威主义的家庭，顺从就是原则，纪律严格而且通常是独断的，而且任何背離传统价值的偏差都会严厉受逞。这样的权威主义个性和佛洛姆早期在权威与家庭研究中所讨论的受虐个性很相像。

威权主义的性格揭示独裁主义与偏見的家庭心理分析动态，但是独裁主义的家庭并不单一产生独裁主义的孩子，因为在此同时为独裁的宰制提供模型，但是无法同样保障个人对抗由额外家庭中介所宣称的社会化。正如佛洛姆指出，法西斯主义、納粹主义与史达林主义有其共同点，他们提供原子般的个人新的慰藉与安全，这些系统是異化的顶点。偏見是持续性的社会问题，因为独裁主义性格是社会产物，就像

家庭动态般的大规模。

亚当諾以独裁主义的性格与观察推論，假使恐惧与破坏性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情感來源，性爱就主要归属于个人。因此假使偏見受到消减以及更进一步的性，教育就必须与民主政治紧密结合。

二次大战后，霍克海默反应德国犹太人的狀況，并推論在纳粹时期的受创尚无法克服，他相信以过去知識保护免于重蹈覆辙，更重要的是，教育能使个人批判煽动主义，所以他们能从煽动主义区分真正的理性政治。

其它理論与学者

基于篇幅限制，我们把焦点放在学会的四位主要学者，但学会早期还有好几位重要的学者。路文陶和本雅明对文学社会学感兴趣；魏復古(Karl Wittfogel)对比较社会学有兴趣；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建立社会学知識，拉查斯菲尔德 (Paul Lazarsfeld) 对美国社会学的传播研究很重要；此外，亚当諾在艺术和文化方面产生相当數量的著作，特别是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批判理論者多样性著作的主要焦点为资本主义的宰制，在战时则是法西斯主义社会。他们建议，因为宰制渗入个性的内部核心，宰制通常不会察觉与理解，这使将如何理論化显得困难，也是对为解放的未來建构当前与系统化的可能造成困难。

批判与結論

对批判理論学者的主要批评是他们仅单纯地以文化分析代替经济分析，如此，假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没有消除，他们的分析是脆弱的；但是批判理論学者自一开始所认为的，在政治经济（基础）与文化/意識形态（上部结构）间的前者区别，在二十世纪就不再主张，兩者批判地相互相关，而且使解放显得困难。在意識型态与文化的焦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受损害心理都是持续关心的一部分，藉由资本主义如何在歷史角度上的改变，以及如何刺激形成更好的世界來作宣传。然而在1930年代后，亚当諾与霍克海默对种族转化的可能变得悲观，也不以直接方式參與六零年代任何激进的学生抗议。

另一个对批判理論的批评，其维持在哲学、非科学性的精神，这无法掌握现代压迫与宰制的「真正」情况。这样的批评是有些正确性，但不应该驳回最初学会成员对战后情况不能、或没有模拟出三零年代的起源。学会在德国重组后，批判理論的研究维持关注揭露优于国家资本主义仁慈的宰制体制。这样的关注焦点影响例如哈柏玛斯等批派理論传统学生的著作。